

编者按

12月22日，霍邱县“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”党课报告会，很特别，报告人是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、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徐贵祥，报告会的主题为“文学与革命——红土地上的英雄想象”。

当日上午，县农商银行报告大厅里座无虚席，徐贵祥从“红色土地上的英雄梦、红土地上的文学与革命、英雄理想与英雄书写、文学想象与文化思维”说起，两个小时的报告，大家仍意犹未尽，现场互动，徐贵祥一一回答了听众的提问后，现场签名赠书。

文学与革命

红土地上的英雄想象

徐贵祥



徐贵祥



徐贵祥部分文学作品

五月份，我所在单位的师生到金寨演出话剧《历史的天空》，段县长派王辉副县长领队，保障刘恒滨、熊水乐等老领导到金寨看演出。演出后，在饭桌上我讲到《历史的天空》的初心，以及文学性与革命性。副书记很有兴趣，当时就跟我讲，这个话题好，你能不能给金寨党校讲一次。我说好。此后，因为忙于创作《英雄山》，这件事情就束之高阁了。恰好霍邱农商行邀请我回来参加一次党课，我二话不说就报了名。报了名之后才发现，这个话题很有创意，但很难讲。作家缺乏理论高度，短于理性思维，都是写得比讲得好。我选了一条捷径，还是从我的经历讲起。

红色土地上的英雄梦

2005年夏，我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返乡，县电视台尹宏声同志写了一篇文章《树高千尺不忘根》，树高千尺不忘根，但是不忘根倒是真的。在我的精神发育过程中，故乡的红色文化提供给我的满满的正能量。

我很小的时候，母亲就经常跟我讲，西南方的大山里有红军，有很多英雄。当时，还有很多民间文学，比如大鼓书，比如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流行的乡村文艺节目，都在无形中影响着我。从这之后，关于革命，关于平等，关于理想，关于信仰的各种想象就像种子一样埋在我的心里，有很多名字在我的脑子里跳跃，许世友、洪学智、杨国夫、皮定均等等。我在读中学读书的时候，常常在下午放学之后，坐在学校东边的山岗上，向南方眺望，想象那里的历史，想象那里的现在，想象那里的人们，感觉那青黛色的山脊线下面，隐藏着很多神奇的东西。这些想象潜移默化，在不知不觉中构建着我的文化心理。我相信，有这种思想经历的，不只有我一个人。

上小学或者初中时，我读过一本小说《破晓记》，从书里读到“霍邱”、“叶集”两个地名，还有一些熟悉的地名，好像还有姚李的大商店，当时非常兴奋，读得如醉如痴，感觉历史距离我们并不遥远，革命距离我们并不遥远。我后来致力于军事文学创作，应该在那个时候就埋下了种子。

洪集和姚李这两个镇，都在霍邱南部，离叶集很近。我舅舅那一茬人都是在叶集中学读书。叶集是未名四杰的故乡，停课闹革命年代，学生从叶集中学带回来很多文学书籍，不久就当作毒草收缴了，我们一半半大概子飞檐走壁从公社的小楼里偷来，坐地分赃，然后互相交换。前面还能看到一些完整的，交换到最后，很多都是有头无尾或者中间断开的。我记不得看了多少这样残缺的书了，刚开始很难受，有的故事看到一半没有了，或者看到后面没有前面的，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干什么呢，就在想那些没有看到的内容，前后左右，前因后果，按照自己的想象把这个故事编圆了。

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，我应征参军，到了部队，迎头撞上中越自卫还击作战，当时的心情很复杂，可以说又惊又喜，年轻人还是有血性的，满脑子都是幻想，想象自己能够像红军时期的杨国夫那样，挥舞大刀浴血奋战。虽然英雄梦没有实现，第一次遭遇战斗还有点紧张，但是总体表现还可以，至少没有装弱。我的家乡有那么多英雄，人们那么崇拜英雄，我不能给家乡人民丢脸啊。

我们一个团的新兵，我是第一个立三等功的，因为我们连是最先进入战斗的。就这一点微不足道的成绩，也足以让我感到很有面子。第二次上战场，要说一点不紧张，那是吹牛。我的父亲当时是洪集公社书记，一方面，作为一个基层领导干部，我父亲是很有政治觉悟的，他当然希望我成为英雄。另一方面，作为一个父亲，我估计他不希望我牺牲，更不希望我被俘叛变。连续几十天音信全无，弄得他那个春节不敢出门，坐在酒桌上，别人一关心到

他的儿子，他的眼泪就出来了，放下酒杯走人，大家都扫兴。真实的情况是，我那时候写了很多信，只是没办法投递。麻栗坡只有雨季和旱季两个季节，春节期间是雨季，邮递员进不了山。

红土地上的文学与革命

多少年来，我一直认为，在鄂豫皖、在江淮之间，在大别山北麓和淮河西岸的广袤土地上，始终弥漫着两股精气神——革命与文学。文学催生了革命，革命滋养了文学，革命与文学就像太阳和月亮一样相辅相成交相辉映。

皖西地区最重要的文化遗产，除了革命记忆，就是文学记忆。

特别值得一提的，是最早回到大别山宣传革命的，是中共早期党员、左翼作家蒋光慈，最早在金寨建立了第一个共产党支部，从此，文学与革命，革命与文学就成为密不可分的战友。另外，中共早期的一位重要领导人，金寨古碑镇的青年学生陈绍禹，最早用诗歌的形式表达他的革命理想，也是从文学的小道上踏上求学之路、寻求革命真理的道路。还有一位鄂豫皖革命时期的重要领导人，茅盾的弟弟沈泽民，实际上是文学理论家，还写小说。当然，还有后来彪炳中国文学史的未名四杰，都是通过文学译作或创作的作品，同革命思潮相呼应。我们常说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但是反过来，这种革命与文学共同浇灌出来的文化，又孕育了一方水土，形成了文学与革命两个车轮并驾齐驱的奇特景观，哺育了这块土地上的人们。

一定意义上讲，文学就是革命。在上个世纪初期，梁启超提出“小说界革命”，鲁迅弃医从文，蔡元培提出“以美育代宗教”，都是希望通过文学艺术改良世道人心，启蒙国家意识，达到救国救民的目的。

回顾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，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发现，历史上那些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，很多人其实也是文学家，比如孙武、曹操、李世民、岳飞、文天祥、曾国藩、林则徐等等。最为突出的，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时代，陈独秀、李大钊、毛泽东、瞿秋白、方志敏、沈泽民等人，诗词歌赋都是大家，有的还写小说，真正是“铁肩担道义，妙手著文章”。

2015年4月份，原广州军区创作室主任给我打电话，说他写了一个话剧《共产党宣言》，即将在国家话剧院上演。我感到很纳闷，不知道《共产党宣言》这么抽象的概念怎么编出一台话剧。组织学生去看，一看，不得了，话剧构思的是一个家庭的故事，女主人公林雨霏早年参加革命，生下一子后，脱离富裕家庭，漂洋过海寻求真理，二十年后在中国革命处于最低潮时回到广州，口袋里装着一本名叫《共产党宣言》的小册子，遭到反动军警追捕，而在抓捕的军警中，就有她的儿子。在监狱中，母子相逢却不能相认，儿子在审讯母亲的过程中，逐步被这位革命者的思想和品格感染，政治立场发生了动摇，开始同情革命，并策划营救这位革命者。而母亲为了保护儿子，至死也没有暴露出她的母亲身份，儿子从革命者的遗物、那本《共产党宣言》的封面上看到了一句话，“为了我们孩子的未来”，泪流满面，泣不成声。

这个话剧非常有震撼力。我的学生，一群“80后”、“90后”的孩子在讨论中说，什么是共产党？共产党人就是为他人谋取幸福的人，把牺牲留给自己，把幸福留给别人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，就是共产主义的初心。

从技术上讲，这个作品没有图解概念，没有堆积口号，共产党是什么，共产主义是什么，全都是通过人物故事来展示的，把一

个深奥的、抽象的概念，装进一个家庭的爱恨情仇、生离死别的故事里。从这个故事中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，文学作品不是娱乐品，不是消费品，也不是教材，它的价值是携带，携带价值观，携带理想信念。

英雄理想与英雄书写

如果说，家乡的红色文化把我培养成一个还算称职的军人，那么，这笔巨大的财富还直接帮助我成为一个“正面强攻战争文学”的军旅作家。除了小时候耳濡目染的红色故事，还有后来逐步深入的了解。我记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，有一次我从部队探亲回家，发现我家和姥姥家都有《皖西革命史》，如获至宝。后来，史红军、徐航两位老师合写了一本《皖西漫步》，集历史、名胜古迹、逸闻趣事、民间掌故、红色记忆、风土人情于一体，可以说就是皖西文化的百科全书。当时我还在解放军出版社当总编室主任，在审稿的过程中，第一次比较全方位地了解皖西文化，受益匪浅，我还写了一个序《文化的力量》。

什么是文化？我的理解就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精神化石，其内涵为集体记忆、集体性格和集体行为方式。离开家乡后，超脱一点看江淮人，我认为江淮人的性格特征还是比较显著的，比如豪爽、乐观、风趣、自信，粗中有细，大智若愚等等。当然，也有虚伪和狡黠、自私自利等等。江淮人的缺点全世界都有，但是江淮人的优点非常适应中国革命的艰苦斗争。当年我构思《历史的天空》时，梁大牙这个人物的身上，可以说是洪学智、秦基伟、杨国夫、皮定均等人的集合体。开国中将杨国夫，原来是洪集会馆村的一个放牛娃，斗大的字认不了一箩筐，但是记忆力惊人，每次到上级接受任务，别人记在小本本上，他全凭脑子记，回来传达，一五一十，一个字不差。我的作品，《历史的天空》中的梁大牙，《八月桂花遍地开》里的沈轩轅、《马上天下》里的陈秋石，尽管都是抗战作品，但是一看就知道，人是江淮人，这些人物的身上，无不打上江淮文化的烙印。江淮文化已融入我的血液，所以我说，胸中涌动的是故乡情，笔下流淌的是淮河水，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。还有后来写的《对阵》，干脆就是以杨国夫为原型，改了一个字，变成杨蓼夫，霍邱一农夫。

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，我有三部作品直接取材于红土地上的红色故事，一部



签名赠书



现场互动



些观点，即便在今天看来，也应该是振聋发聩的。

还有一部小说，创作萌芽更早，叫做《霞飞湖》，以霍邱城西湖退垦还湖为背景，设计了几个基层干部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，秉持共产党员本色，带领人民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故事，但是因为离开家乡很久，对于当下的农村生活不熟悉，难为无米之炊，所以一直没有写好。前几年，我又构思了一部小说，主题是红色革命与改革开放，暂名《飘呀飘起来》，框架是两个时空，一是大别山革命者韦梦为独特的革命斗争经历，二是韦梦为的咏叹，为新时代表党领导带领老百姓追求美好生活的故事。两个世界两代人，一个初心一种精神，互相打量，亲切对话。韦梦为问，当年我们闹革命时对老百姓的承诺，实现了没有？后人回答，实现了一部分，还有一些仍然需要进行伟大的斗争。这个小说也没有写完，这次回乡之前，突然产生灵感，是不是可以把两个小说合并起来，就叫《初心》，当然，这只是灵光一现，是故乡给我的又一个启示。

文学想象与文化思维

故乡的红色文化和文学氛围，不仅滋养了我，还滋养了更多、更有成就的作家和艺术家。这些作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坚持本土化写作。前天我查了一下电脑，我为家乡六位作家作过序，其中三篇的标题里面都有“淮河”两个字，譬如为陈斌先作序《淮河岸边的咏叹》，为张烈鹏作序《淮河无弦万古琴》，为黄圣凤作序《淮河的前方是大海》。另外为张子雨作序《比小说精彩的是生活》、为流冰作序《快乐的乡愁》，其作品都是淮河岸边的故事。

插一个小故事，大约是五年前回家乡，我家门前的新华书店搞了一个“霍邱作家专柜”，记得是刘恒滨主席，故意调侃张子雨说，霍邱作家专柜，怎么里面都是贵祥的作品，看不到你们的书？张子雨眯眼一笑说，哦，看不到我们的书，那是正常的，我们的书都卖完了。这话讲得俏皮，我很舒坦，家乡的作家都是英雄，家乡遍地文化人，家乡遍地英雄花。

家乡除了发达的文学事业，还有一些值得关注的文化事业，比如张玉柱的剪纸，记得三十年前，我回霍邱，陶锦源老师组织霍邱文学青年聚会，就有张玉柱，当时没有搞出名堂，后来听说穷困潦倒，但是他没有放弃，锲而不舍，一直做下去，结果越做越大。还有一个例子，去年我到六安参加文代会，往会场去时，一个女同志从后面追上我，给了我一只泥塑的小兔子，很可爱。这个女同志就是临淮岗的田孝琴，祖传泥塑工艺，用淮河的泥巴讲述淮河的故事，非常独特。

前两年回霍邱，认识一个复员老兵冯强，这个老朋友，用另外一种方式讲述霍邱故事，搞了一个农民展览馆，收集农具。我去参观过，每一件农具都带着历史的印记，背后都有故事，非常有意义。

我们霍邱，处在鄂豫皖交界区，西南方有大别山红色根据地，东北方是淮河流域，东南方是改革开放前沿上海和南京，融汇了南方楚文化、中原农耕文化和海洋文化，但我们的文化建设不能搞大杂烩，也没有必要赶时髦，我们一定要找到自己的特点。文化的价值就在于特点，特点就是差异性，是别人没有的东西。

讲个笑话，十几年前，孙俊同志带我到金寨江店，跟老朋友聚会，老朋友姓叶，爱讲笑话。他让我给他饭店起个名字，我想来想去，最后提笔给他写了五个字，“叶个熊饭店”。他哭笑不得，拒绝用这个名字。两年后我问他生意怎么样，他说一般。我说当然一般，你换上“叶个熊饭店”试试，这个名字没准真能打响，因为有特色，别具一格，至少比你那个“饭店”强，到处都是“光明饭店”，你那个算啥？

去年六安文代会期间，我写了几篇文章，其中一篇叫《鸟儿在歌唱》，主题是呼吁“诗意地栖居”，强调乡镇文化建设突出特色，另一篇《未名四杰的故乡》，谈到叶集文化发展，我以一个游子的身份，提出以下建议：一、改叶集区为未名区。随着行政建制升格和发展需要，叶集这个地名，已不适合行政区划建设格局，改为未名区，则意味着彰显文学特色，擦亮文化品牌。二、开辟微特区，建鄂豫皖三条街，融合楚文化、中原文化、徽文化，集旅游、商贸、文化产业于一体。三、四合一，白塔镇划入未名区，蒋光慈与未名四杰同属一区，便于统筹规划，集中打造，整体宣传。

在故乡滞留的那些日子，我到过游说，逢人就谈我的几条建议，家乡包括市、县(区)领导、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、作家艺术家朋友，很多人知道这件事，很多人认为可行。我希望在座的同志同意的设想的，帮助呼吁。套用伟人的话说，我们的目的就一定要实现，我们的目标一定能实现，我坚信，这也是家乡人民的集体意愿。

本版活动现场图片由 本报记者 流冰 摄

